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社会科的使命与魅力

——日本社会科教育文选

[日]市川博 主编 沈晓敏 主译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The Mission and Attraction of Social Studies

教育科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工程”

社会科的使命与魅力

日本社会科研究
——以《社会科》杂志为中心——

主编 王康 副主编 王德峰 王学东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

（上海）2014年11月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日〕市川博 主编 沈晓敏 主译

文库主编 钟启泉 张 华

社会科的使命与魅力——日本社会科教育文选

The Mission and Attraction of Social Studies
—An Anthology of Japanese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策划/组稿 韦 禾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贾艳凤
责任校对 张 珍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科的使命与魅力: 日本社会科教育文选/(日)
市川博主编; 沈晓敏等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4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钟启泉, 张华主编)
ISBN 7-5041-3103-2

I. 社... II. ①市... ②沈... III. 社会科学课—教
学理论—中小学—日本—文集 IV. G633.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5411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06-2102 号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 9 号

市场部电话 010-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64989419

传 真 010-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0.5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字 数 488 千

印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印 数 1-3 0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社会科的使命与魅力——日本社会科教育文选

SHEHUIKE DE SHIMING YU MEILI

—RIBEN SHEHUIKE JIAOYU WENXUAN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
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研究项目



市川博

作者简介

市川博教授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筑波大学前身）教育学部，曾进入该大学教育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因工作关系退学。历任大阪府立大学、东京教育大学助教，横滨国立大学副教授、教授。2003年，从横滨国立大学退休后，任帝京大学教授。

市川博教授早年研究近现代中国教育史，是日本研究中国教育尤其是中国历史教育和公民教育的主要代表。20世纪70年代后主要从事社会科教

育研究。其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深度，而且能与实践密切结合，培育了众多优秀的社会科教师，对课堂教学的变革产生了重要影响。代表作有：《社会科教学：追求基于实感的理解》（1983）、《社会的变化与社会科教学》（1989）、《社会科、生活科与国际理解教育》（1994）、《创造运用磁性姓名牌的讨论课》（1995）、《指向问题解决学习的教学与评价》（2003）、连载系列论文《社会科教育中的学力与人性培育》（1980—1982），等等。

此外，市川博教授还担任过日本社会科教育学会会长、日本教育学会秘书长、日本学科教育学会副会长，以及日本教师教育学会、日本教育方法学会、日本课程学会的常任理事，并担任在社会科教育界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教育研究团体“秉持社会科初衷学会”会长，20世纪90年代初被授予华东师范大学顾问教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顾问教授。市川博教授为推进中日两国的教育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

编 委 会

主 编 钟启泉 张 华
编委会成员 钟启泉 高 文 张 华 李雁冰
崔允漷 孔企平 王红宇 郭洋生
李树英 欧用生 (台湾)
罗厚辉 (香港)

【美】派纳 (William F. Pinar)
【美】多尔 (William E. Doll, Jr.)
【英】劳顿 (Denis Lawton)
【加】范梅南 (Max van Manen)
【加】史密斯 (David G. Smith)
【日】奥田真丈
【日】市川博

在东西方对话中寻求教育意义

——“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主编寄语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科学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开始由探究普适性的教育规律转向寻求情境化的教育意义。这种“范式转换”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有突出表现。课程研究领域开始超越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具有理性主义性格的“课程开发范式”，走向“课程理解范式”——把课程作为一种多元“文本”来理解的研究范式。教学研究领域则走出仅作为教育心理学之应用学科的狭隘视域，开始运用多学科的话语来解读教学的无尽意义。于是，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返魅”了：五彩缤纷的话语体系竞相追逐、璀璨夺目、魅力四射！

“返魅”后的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有一个饶有趣味的特点，那就是自觉地在东方文化中寻找课程与教学智慧，试图在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实现东西方文化的会通与整合。现象学的、存在主义的、解释学的、后现代的、全球化的课程与教学

理论皆有这种特点。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课程与教学理论应怎样确立自己的生长点？答案是确定无疑的：立足中国课程与教学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既扬弃中国古代课程与教学话语，又与世界其他文化体系中的课程与教学话语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在这种“扬弃”与“对话”中建构具有民族文化风格的课程与教学理论。

基于此种认识，我们选取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特别是 90 年代以后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名著加以选译，以为东西方课程与教学理论的对话提供一个“平台”。我们期盼着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课程与教学理论不断走向繁荣与辉煌！

钟启泉 张 华

1999 年 12 月 22 日

编 者 序

本书作为第一次将日本战后有关社会科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著作，并作为钟启泉教授和张华教授主编的“世界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中的一册出版，我深感荣幸。

在日本，社会科教育的目的概括地说就是培养公民资质（citizenship）。所谓公民资质，一般来说就是作为国家和社会的成员所必须具备的知识、能力、情感和态度。在日本，“公民”一词的正式使用开始于1968年版的社会科学习指导要领，该学习指导要领将社会科的目标定为“加深对社会生活的正确认识，培育民主国家和社会的成员所必需的公民资质”。在1998年修订颁布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初中社会科公民领域的目标被定为“让学生以宽广的视野正确认识维护个人的尊严与人权的意义，尤其是自由、权利与责任、义务的关系，在加深理解民主主义的同时培养担负国民主权的公民所必需的基本素养”。

“公民”一词不仅指国家的一员，而且指社会主权的担负者，即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要以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中。但是，由于在二战时期的日本，“公民”一词曾等同于为军国主义国家效劳的臣民，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所以日本有很多人开始用“市民”一词取代“公民”。

近年来，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国民的责任和义务的强调甚于对国民的权利和自由的强调，公民的概念又逐渐具有国家主义色彩。鉴于此现状，我也在此主张使用“市民”一词，突出强调社会科所培养的是国家和社会的主权担负者，回归社会科原本的目的。

此外，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各种接踵而至的新问题，日本社会科教育

界开始从全球视野出发,重新探讨市民资质的内涵以及市民培育的方法,出现了“地球市民”等概念。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社会科培养市民的使命变得更加任重而道远。

被赋予这一使命的社会科追求的是一个儿童自主地、个性化地投入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学习方式,它比其他任何学科都更关注每个个体的兴趣、经验和认识,更具超越学科界限的弹性和生动性。无论是对教师还是对学生来说,社会科都是一门充满创造性的、魅力无穷的学科。本书将向各位展示日本社会科的具体形态,以及有关社会科的意义、课程结构、教学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成果。

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起也开设了综合性的“社会”学科,并在21世纪初的课程改革中再次重组社会类课程,新设了“品德与社会”和“历史与社会”等课程,从而将有关社会科的研究与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我想,为了新一代能成长为勇于挑战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富于智慧地开拓新世界、创造新生活的市民,中日两国的研究者和教师有必要携手合作,共同探究社会科教育的发展方向。作为今后开展共同研究的基础文献,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具有其特别的意义。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本书中的论文,在此请允许我对日本社会科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科诞生的意义作一些补充说明。

一、日本社会科的萌芽

1. 日本社会科的理念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为了推进适应地区特点和儿童个性的教学,课程和教材逐渐走向多样化,《社会》、《品德与社会》、《历史与社会》等综合性课程也相应诞生。这种情况与日本社会科的诞生是十分相似的。日本社会科的基本理念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1) 注重儿童拥有自己迫切的需要和兴趣,并自主地展开探究社会问题的学习活动。

(2) 为了保障学生的自主学习活动,强调教师要根据地区、学校、班级及学生个体的具体情况,富有弹性地制定教学方案与选择教材,并且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在教学过程中灵活地修改教学方案。

(3) 为了让学生自主地、自由地围绕自己的问题意识展开学习,必

要时可以打破学科的框架展开学习活动，整合各种学科的内容开展综合性学习。

(4) 通过上述这种教学，使每个学生能自主地选择并获取知识和技能，深化对社会的认识，提高自主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能力，培养他们成为民主与和平社会的建设者。

上述社会科的理念实际上隐喻了社会科所拥有的独特魅力。

虽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学科都抛弃灌输主义，实现学生自主地、充满热情地学习，培养出扎实的学力，但在现实中，很多学科依然进行着枯燥乏味的知识传授。然而社会科却不同，教师要从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中发现“儿童成长的萌芽”，每个学生都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开展富有个性的探究活动，同时个性与个性相互碰撞、磨合，形成集体的力量和智慧，投入到“穷追不舍”的探究中。学生就在这样的探究过程中，在教师的援助下，获得社会知识和社会技能，最终形成教师所期望形成的学力。社会科走在其他所有学科之前，实践着这样的教学。

本书“基于问题解决的社会科”一文通过具体的教学案例展现了社会科课堂中儿童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以及由此形成的学力。当儿童自主地挑战问题、开始深入探究的时候，为了推进这种探究活动，有时会远离教师既定的教学计划，甚至跨越学科的界限。而正是教师支持和保障了这种富于弹性的探究活动，学习才变得富有震撼力和创造性，解决问题所需的能力也自然地得到发展。这就是社会科的妙趣之所在，教育核心之所在。总之，社会科就这样通过学生富有创造性的、自由的探究活动，培育学生科学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变革社会的力量，由此显现其无穷的魅力。

这样的社会科诞生于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但是其理论与实践早在战前就已经萌芽，在遭受军国主义压制的背景下，悄然地蓄积着实践经验。

为帮助读者理解日本社会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所产生的历史背景，我首先介绍书中未涉及的社会科的萌芽期。

2. 对儿童的生活、兴趣（游戏）及合科教学的关注——“儿童的世纪”拉开序幕

20世纪被称为“儿童的世纪”，儿童在这个世纪作为学习的主体开始受到尊重。

1900年,在这个19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女教育学家爱伦·凯(Ellen Key, 1849—1926)怀着她对新世界的祝愿,作为“献给所有希望在新世纪创造新人的父母们”的礼物,出版了《儿童的世纪》一书。她在书中对当时学校所进行的形式化的大生产式教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斥责它们压制了儿童的本性,倡导开展使儿童的生命得以自由发展的教育。爱伦·凯呼吁道,所有的儿童都潜藏着与生俱来的至善至高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应受到成人的压制,而应该无限制地去开发这种与生俱来的本能、素质和个性。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教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也于1899年出版了《学校与社会》一书。他尖锐地指出,以往的学校仅仅关注教师和教科书等儿童之外的事物,而不去关注儿童直接的本能和活动,学校已经不再是儿童生活的场所。同时他阐述了将儿童作为学校的中心、将学校作为“儿童在其中进行适合其特点的生活”之场所的重要性、意义和方法。

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筑波大学前身)附属小学教师樋口堪治郎(1871—1917)于1899年出版了《综合主义新教学法》,倡导“儿童成长的源泉存在于儿童充满兴趣地投身其中的游戏中。这种游戏活动要成为跨越学科界限的综合性的活动”。他在书中介绍了二年级学生开展的“飞鸟山的远足”学习活动,具体展现了这种游戏活动的形态和意义。

孩子们拿着地图去飞鸟山远足。在远足过程中,孩子们与动物学(蝗虫、鸭子)、植物学(麦子、茶叶)、农业(肥料、耕作、收割)、商业(沿街商铺、茶馆)、工业(铁道、火车、工厂)、地理(方向、丘陵、交通、河流)、地质(河川的变化、沙地、湿地)等方面的具体事物和现象相遇。由此生发了将所见所感写成作文(国语)等的综合教学。

在远足过程中,孩子们亲眼见到了推磨的老人、洗萝卜的村姑、编草绳的少女。我就把这些看作与他们将来进入大学学习历史和人类学时所接触和学习的素材基本相同的内容。

此外,当看到孩子们选择在看得见原野和山丘之风景的地方吃饭时,便想“这是在酝酿学习和创作关于自然的诗歌的契

机”。我从孩子们的身影中寻找适合孩子们的学习（成长）方式，再给予适切的指导。

这本书几乎没有让人觉得是100年之前写的，至今仍有着与今天的综合学习存在诸多相通之处的新鲜感。当时樋口是冒着遭受教育界严厉批判的风险出版这本书的。顺应儿童的教育凭借着这种坚定的信念和勇敢的实践得以在日本起步。这种对于教育的毅然决然的精神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教育浪潮

100年前，爱伦、杜威和樋口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划时代的教育理论，但是由于1903年日本实行了教科书国定制度，统一了全国的教科书，强化了军国主义教育，在这种形势下，要将他们的理论变成具体的实践是十分困难的。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掀起了一股崇尚自由、和平的浪潮。教育界也开始变革那种根据模型来铸造儿童的教育，关注儿童的愿望和生活的新教育在全世界广泛开展起来。就在这种形势下，杜威于1919年来到日本宣传他的新教育理论。然后，他又来到中国，在中国逗留的1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杜威为普及新教育而积极奔走，为中国早于日本24年诞生综合社会科（1923）起到了推动作用。30多年前，即20世纪70年代前后，我曾经就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如何传入中国写过数篇研究论文。

在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1917年，由京都大学校长泽柳政太郎（1878—1927）担任校长的成城小学设立。

泽柳在建校时提出：“必须改变预先制定教学细目（即教学计划）的做法，而要先对每天的教学过程作精细的记录，严密细致地琢磨儿童的自然要求。最早也要在建校一年后才能制定出教学细目的方案。”根据他的指导，整个学校没有固定的课程表，一至二年级算术科和一至三年级的修身科不单独设置。教师们严谨地观察、分析学生们自然表现出来的需要，综合并富有弹性地开展教学。成城小学的实践作为社会科的原点、教学的原点，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就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儿童实际需要的教育首先在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得到了推进。同时以推进新教育为目的的私立学校也相继

设立,促进了新教育理论的广泛传播和实践。

此外,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现奈良女子大学)附属小学校长木下竹次(1872—1946)在合科学习方面进行了大胆实践。他在1923年出版的《学习原论》一书中指出:“必须由学生自主地综合各门学科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内容,自律地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并实践之,从而实现全人格的整体发展。”

对于在合科教学中学生全身心投入某个学习活动的现象,木下阐述道:“不必担心学生因热衷于一件事情而导致他的生活发生偏向。如果出现了热衷于图画的学生,那就接受他,并去保障他的活动。因为要画好画,就必须将自己整个身心投入活动之中,所以让学生展开全身心投入的活动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活动,他就自然会需要绘画以外的知识和能力。”也就是说,当学生要画一个兔子的时候,他不得不对兔子的眼睛、鼻子、耳朵、四肢和皮毛作仔细观察,否则就画不好兔子。在观察的时候,他自然地就进入了有关兔子的形态以及有关动物基本形态的理科内容的学习,并发展了对事物进行细致地、正确地观察、记录、绘制的能力,为今后进行更广泛的学习奠定基础。这一合科学习、综合学习的基本理念成为日本教育史上极为宝贵的财富。

不过,学习不应仅仅顺应学生的兴趣,而是应该以此为基础,引导学生进一步关注社会问题——当时日本封建的军国主义体制。当时担任成城小学校长的小原国芳(1886—1977)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此进行了剖析。1920年小原出版了《修身教学改革论》一书,首创了取代修身科的现代科。他提倡在现代科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深入到劳工问题、普选问题、妇女问题、国际问题中去,并且要深入到令他们产生惊讶的程度,从而自己去发现真理。

小原的理论具有社会改造主义性质。此外,他还领导开展了生活作文运动,让学生通过观察、记录周围的生活,直逼农村社会的贫困问题及其背后的封建军国主义体制。

但是,由于这些实践在当时包含了反对社会制度、倡导自由主义的“危险思想”,所以自大正(1912—1926)末年开始遭到了压制。不过,1941年,出于培养效忠天皇的军国主义国家国民的需要,日本创设了综合国语、修身、地理、历史学科的国民科,也就是在形式上采纳了“学科整合”的课程形态。